

《中国作家》《长城》《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

在“反常”中重新认识自己

□王晓梦 李静文

文学与时代生活之间存在某种默契的约定，文学总是一叶知秋式地呈现着时代生活的剪影。任何时代的影像都是复杂的、立体的，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恰以简约而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侧面，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常与变，展示了丰富的人生样本，为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留影。2024年伊始，《中国作家》《长城》《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陆续推出一批中短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生活底蕴浓厚、故事丰满，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小说写作的新动向和新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瞥见了日常生活中的“反常”之处，察觉到现代人在稳健的生活秩序下正滋生出某种斜逸而出的冲动，并预感到这种看似悄无声息的“反常”即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平常。作家们热衷于以日常生活中非典型事件或细节为切口来展开小说情景，讲述现代人如何在风平浪静的生活表象中“猛然听见自己体内的暴风雪”。我们看到，小说人物纷纷对妥当的现状升起了莫名的疑问，在常规的日程、平静的心态之中，他们毫无征兆地跌进了某种一反既往的心境界——坐轮椅的老人甘愿以“求爱者”的姿态对待一条狗（张鲁镭《老人与狗》），已婚的男人为了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姑娘送上108首原创诗篇（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几经周折考入所爱专业的文学博士面对空白文档惊觉自己早已淡忘曾经的学术梦想（丁小龙《众妙之门》），临近退休的父亲毅然辞职后在一次岩洞探险中失联（陈炜《带你回家》），因疫情失业的青年投宿在郊野公园却意外邂逅了一段莫名的爱恋（陈武《月光》）……小说人物这些看似出格的举动背后，实则是蛰伏在现代人内心深处某种与社会秩序相脱轨的、不可言说的愿望。而由这些“反常的一瞬”的迸发牵连出的则是一连串长期被遏抑在意识冰面之下的“自性”的频繁浮现。

在严丝合缝的生活节奏和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里，小说人物却一反常态地涌现出突如其来感慨、莫名高涨的情绪、超乎寻常的激奋与冲动，又或者表现出某种逾越理性的逃避、陡然直下的颓唐、平白无故的不甘与郁结。如李小平的中篇小说《相见欢》（《四川文学》2024年第2期）写教授之子赵明溪和穷苦出身的女子陈静婷之间殊途同归的叛逆与追求。赵明溪毕业后拒绝留在高校，铁了心要和父母过不一样的人生。疫情的爆发使他面临着“断炊”的可能，然而即使精神失意、经济困窘，他却从未向父母言及。追溯这种反常的倔强和自尊背后的成因，是年幼的他在父亲的咆哮和打压力教育中所遗留下的恐惧和耿耿于怀。陈静婷是山区里的穷姑娘，初中毕业就面临辍学早嫁的危机，她历经辛苦借债读书、扭转命运，来到文化馆当临时工后却对混日子的生活深表怀疑，于是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拂袖辞职，离开了体制的岗

位，在城市街角开起了一家收入甚微的书屋，投入到另一种诗意的颠沛中去。《相见欢》中的男女主人公过着天差地别的人生，却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拒收命运中那些包装精美的机遇和顺境，因为对于两个追求无拘与自由的人来说，被设计好的人生路线只是一种假扮成礼物的重担。

王祥夫的短篇《糖醋里脊》（《山东文学》2024年第1期）以隐秘而细致的笔触讲述了一则异乎寻常的青春爱情故事。热爱溪边垂钓的男孩旁观着父母的争吵，在母亲离家出走之际，他似乎格外关心起她的裙摆。注视着瘫痪在床的祖母，他听见自己浸在她耳边重复着诅咒的话语。这个男孩似乎从水深火热的家庭争端中抽离出来，而他潮湿悸动的心事像是刚钓上岸就被黑猫拖进床底的那条鱼。邵风华的短篇《坦克与爱情诗》（《雨花》2024年第2期）记录了曾经发誓要共同碾碎荒诞现实的“三辆文学坦克”的日渐疲惫与失联。“我”发现并默许了妻子的外遇，高超为保住编辑工作加班加点，而他们之中最具豪情与诗情的鹿平，曾满怀激情为陌生女孩写下一部诗集，而今也已销声匿迹，“他毅然走进了一片迷雾之中，再也没有回来——他变成了迷雾的一部分，连自己也不能触摸到自己”。（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普遍显露出一种游离的、边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看似荒唐无稽、不走寻常路，使人猜不透背后的真实动机。实际上，小说人物正深陷精神的困局：在丰盛错杂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他们感到一种“始终悬浮在空中，无法脚踏大地”的抽离感，这种混沌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人物灵魂难安现状的骚动。一种反常的隐衷正召唤着他们踏上自我探索的道路，一边背负着世俗的规约，一边跌跌撞撞地在心灵世界里寻找出口，直到有一天，他们在那些搭错筋似的、不应有的想法中瞥见了被长久遮蔽的关于自我的深渊。如果生活总是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极有可能对自己被裹挟的真相习焉不察，反常的魅力就在于它如同一颗掷向湖心的石子，让原本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反常牵引着人物做出意料之外的抉择，从而闯出了一片“秩序之外”的园地，人们

在这方域外的乾坤里重逢世界、邂逅自己，那些本已停滞的故事、早已搁浅的往昔再次抽枝发芽，这也让小说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叙事张力。

在作家们的笔下，“反常”已经逐渐渗透到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规范之中，婚姻生活、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成长、人际相处等看似稳固的关系和机制中，都隐隐嗅到了反常的气息。《外婆的海》（蒋一谈）、《清风徐来》（弋铎）、《我的学生赵章来》（陈然）、《风热》（李国彬）、《不可能的任务》（黄平）、《公交站台》（陈武）等几部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新冠疫情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人们一方面渴望与世界发生联结，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客观上将奔忙的上班族从所谓的事中解救出来，人物时不时也期待着一段如同张爱玲笔下的电车男女似的邂逅——一段常规叙事之外的佳话。已经站在人生中途的男人流露出的迷茫和惶惑比其年少时有增无减，庸碌了大半生的人物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悄然失踪，曾将幼女寄送给他的父亲在一场车祸后踏上了寻女的列车，常年北漂的女人拉着一只皮箱回到渔船上捕虾，女白领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小她9岁的男同事，戏剧名校毕业的男子乔装成拾荒的老头驻扎在沼泽边缘……在这个信息过剩而想象力渐趋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忘记了排斥与拒绝。现代人热衷逻辑分析，执迷因果关系，急于寻求认同与安全感，因此无心去领会会尘封在心底的感性景观，无暇理会反常的念头或场面，甚至将其视为麻烦。而在“反常”的召唤之下，人们终于拨开遮蔽，发展出了曾不被允许的个性，见到了那个素未谋面的自己。

反常召唤着小说人物吐出那些“再憋下去就会发霉的心事”，将那些再等下去就会遗忘的梦想一一付诸实践；反常告诫人们“所谓的大多数人走的路，有时候是个骗局”，所以接纳自己的失控，容许生命中的意外，让故事发生。“反常”是一场以生活为基调的变奏，因此它是有限的；它看似制造谜团，实则通往真相，它通过引起灵魂失重让我们得以暂离一地鸡毛的地面去俯看日常经验、拨正错位的心灵。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关注

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黔村行记》（《求是》2024年第1期）、《天堑变通途》（《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风景这边独好》（《山花》2023年第11期）、《高原醒了》（《中国作家》2023年第11期）是通过文学纪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力量，作品充盈文化自信与史学哲思，是纪录山乡巨变“论文”中的优秀篇章。四部作品都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成就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反复比较，让历史为现实作注，充满比较之思、辩证之法和哲理意义。

作者在黔中历史的最远处开始注目扫描，远自春秋属楚以降，中至盛唐“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下至明代奢香夫人“开辟驿道，以供往来”的筲路蓝缕，王阳明的感叹“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直至今日外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概括。历史和现实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交汇，并在十八大后发出澎湃交响：“雄踞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座桥梁，实现悬索、斜拉、拱式、梁式类型全覆盖，成为当代桥梁的百科全书，创造了数十个‘世界第一’，赢得了‘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的美誉。世界高桥前一百名中有近一半在贵州，前十名中有四座在贵州，桥梁已成为贵州与世界对话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和最具自信的独特文化符号。”作者的自豪感来自抚今追昔的历史自觉和当下宏阔世界视野下的制度自信。

乡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变成现实的最重要的地方。通读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总是能感受到作品中喷射出耀眼的火光和金石之声，甚至能感觉到一种直堪喷涌的悲壮：从瑶山村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到现在的现代化生活，“经历了七次搬迁，可谓千年之变，这一变，彻底撕掉了瑶山绝对贫困的标签”。可这场战斗凝聚了多少驻村第一书记、攻坚队长、驻村干部、网格员们的心血啊！人民是第一英雄，“（瑶山）村里2021年公益岗位有二百四十五人，其中护林员一百九十一人，年工资一万元，扶贫援助岗五十四人，年工资四千八百元。2021年外出和本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一千零五十人，其中省外务工二百七十六人，省内县外务工九人，县内乡外五十六人，乡内务工七百零九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是让整个民族脱离贫困获得幸福，这就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历史任务的内在逻辑。当然，这场伟大变革绝不是锦绣文章汇聚的浪漫洪流，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先锋队的带领下，为了摆脱贫困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派出了300多万扶贫干部，近1000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线上。贵州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变革再一次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深刻论断的史学意蕴。欧阳黔森作品的真实感是他用双脚丈量出来的。曾作为地质队员的他，走遍了作品中提及的脚尧村、瑶山村、花江大峡谷等地，文中获得的近千个数据，都源于对黔中大地深沉的爱：“每次站在群山之巅，极目眼前的千山万壑，总想放开喉咙吆喝个痛快，当一声声吆喝在起伏的连山中激荡出一阵阵嘹亮的旋律时，这样的嘹亮，就成了我再次攀登的号角。”

《天堑变通途》等四部作品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文艺家在创作生态题材作品时应当具有清醒的辩证法。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总是那么的自信甚至自负。可以说，长期以来，人类在认识生态环境时，似乎以主宰者的身份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甚至忘记了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人类在积累生存经验时逐渐发现，原来我们对待自己生存的环境过于贪婪甚至残酷，大自然也以同样的残酷力量反噬人类，一句话，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乎，人们在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似乎又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端走向了顺从自然的另一端。一些生态题材作品，在展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充满无力感。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和他以往的小说《绝地逢生》等作品一样，展现了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敏锐性和力量感：“花江两岸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两岸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石头的王国’，很少见到泥土，更没有茂密的森林。对于旅游观光者而言，这是一道风景，而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这种石漠化土地上的生存条件却是很难的。真丰人硬是在这种被认为‘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发展生态农业，种植万亩花椒，将石漠变成绿洲，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可以说，“为何而‘绝’，因何而‘生’”，欧阳黔森的作品辩证回答了人类应如何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一系列作品也就具有了人类学哲理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让历史为现实作注

——欧阳黔森四部近作启示意义

□张金尧 陈亭伊

■评论

重器的深度与「牛人」的高度

——读报告文学《海牛》

□丁晓原

张雪云的长篇报告文学《海牛》从时代全局出发，以国之重器“海牛”号海洋钻机系统研制应用为题材，讲述了以强国建设为己任的“海牛”号首席科学家万步炎及其团队成员的事迹。作品既写出了“海牛”号的技术深度，更呈现了“海牛人”的精神高度。

报告文学的写作，尤其时代主题的报告文学写作，作者要善于从广袤的现实存在中寻找鲜活特异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题材，以具有叙事新形式的新质创作，实现报告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张雪云的《“海牛”号》就是一部具有新质要素的优秀作品。“海牛”之“牛”首先在于海。地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蓝色是海洋之色。海洋不仅是人类的摇篮和故乡，还是人类未来重器的希望所在，更处在今天强国建设的前沿位置。作者从海洋与人类的关系、海洋资源的丰富蕴藏、全球经济体海洋发展战略趋势等广阔的背景中，观照透视“海牛”号具有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的意义决定着“海牛”号的意义。“海牛”之“牛”还在于它关联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海图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议题。正是由于作者注意将具体微观的事物置于宏阔的背景中叙事，所以读者从作品中不仅能够获得许多新的知识信息，更可以深刻地领会“海牛”号谓之大国重器的核心价值。

《“海牛”号》是一部专业性突出的报告文学。专业性写作会增加创作的难度，但与此相生的是其写作的新价值。“海牛”是一种用于海洋钻探取样的机械装置，作者通过访谈请教科学家、研发人员和大量的专业性阅读，使自己得以“入行”，帮助

读者获取“海牛”以及相关设备的系统性信息，包括海底钻机的基本结构、物性功能、技术难点以及各国研制的历史与进展等，尤其对“海牛”号研制的全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述。由此，《“海牛”号》建构了一部关于“海牛”号的专门史叙事，为作品整体价值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自然，《“海牛”号》不仅是关于大国重器的专业报告，更是对创造这一重器的“海牛人”精彩传奇的记录。被誉为“深海神兽”的“海牛II号”，能够在海洋深底下钻231米，而且具备保压取芯的功能。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海牛”创造的海洋深底下钻的世界记录，彰显出了中国争先的力量，而它的深度正好映照出中国“海牛人”的精神高度。作品通过“海牛”号和“海牛人”的复合叙事，以“海牛人”的故事作为叙事的重点，从而生成了物与人兼得的丰富而厚实的报告。《“海牛”号》人物叙事的中心是“海牛之父”万步炎。万步炎是“时代楷模”，获得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国家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地方。’这是写在‘海牛’楼里的一句话，也是他和团队的精神坐标。”“精神坐标”的指认充分说明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精神特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在作品中，“牛”与人实现了精神的高度联通，勇武坚韧、负重奋进的“牛精神”，正是“海牛人”能成大事的精神的生动写照。万步炎有开启人生之路的三把钥匙：“忠诚与热爱，独立与创新，坚守与坚持。”作者通过一次次挫折与突破的递进性细写，揭示出万步炎朴实高尚的精神品格及其事业成功的关键密码。作品对万步炎形象的再现是多维立体的，工作中的他执着严谨，生活中的他不乏情趣甚至浪漫。作品对“海牛”团队的叙写用笔不少，这些笔墨既是对万步炎为人处事的侧写，也呈现了他们共克艰难、相互成就的团队精神。

张雪云的《“海牛”号》与流行的报告文学制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既不是新闻报道感突出的报告，也不是小说化色彩鲜明的非虚构，而是一种颇多散文笔调的写作。作品的书写调和了客观性的叙述和主观性的描写，兼具了纪实性、抒情性和写意性。这样的写法自然与其散文家的底色相关，而在《“海牛”号》中散文文化的描写与作品的内容刚好适配，新质报告文学的写作应该追求这样的与题材相适合的取新形式。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新时代散文的勃勃生机

□刘笑伟

在文学期刊众多、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每年在报纸杂志、网络平台上刊发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如何做到“略其芜秽、集其菁英”，为喜爱文学的读者集中呈现优秀作品，是一件虽然困难，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发起遴选的《年度散文50篇》，对于新时代散文的创作、推介功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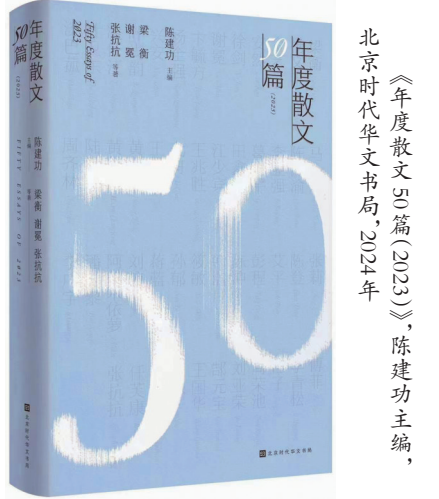
《年度散文50篇（2023）》充分展示了2023年度中国散文的总体风貌，书中既有了散文名家“宝刀不老”的精品，也有青年作者“雏凤清于老凤声”的佳作。这些作品引领着散文创作的走向，也展现出新时代散文创作的突破与思考。可以看出，过去的一年里，散文作家的视野更加宏阔，创作出的作品广度亦得到不断拓展。其中选出的50篇散文佳作，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直面书写，也有对历史题材的深度挖掘；既有个人情感与经历的真实体验，也有对自然风景与生态文明的生动描述；既有鲜活生动的新时代人物群像，也有个人内心与灵魂的细微感悟。正如评审委员会主任陈建功所言：“2023年一年，散文创作的收获是丰硕的。数量就不用了说，就创作质量而言，题材之缤纷、角度之新颖、情感之丰沛、语言之曼妙，实在是令人欣喜。”

《梦回塞上》中，梁衡通过生动的叙述，让我们领略到凌汛开河的惊心动魄、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包饺子的酣畅淋漓，以及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后写出小诗的莫名激动。深沉的记忆中，流淌出的是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由此可见，对于一位散文作家而言，扎根生活有多深，就会有多么丰富的素材；提炼生活的力度有多大，作品就会有多么丰富多彩的色彩。有多次云南之行的采风，让徐剑收获了“记忆像米轨一样长”。在西南联大旧址，徐剑看到了“一张褪色发黄的入学登记表，镶着一双如云南天空一样明亮的眼睛”，他就是郭永怀，与钱学森同出一个师门，1954年毅然回到祖国后，

参与导弹原子弹试验事业。一次飞机失事，他与警卫员抱在一起，牺牲时还不忘保护原子弹的绝密文件。英雄已随烟云远去，但英雄的精神依然穿越时空，成为激荡人心的永恒旋律。历史永远是文学的富矿，深入进去，总会发掘出时代精神与永恒的价值。安然的《万鸟岭上》、兴安的《在昔者黑看见一匹马》等作品，让人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能从动物身上看见人的精神光芒。凌仕江的《微尘大地》在对细致事物的描写中，拓展了对藏地生活的倾情书写。

散文贵真，这个“真”字既包括了散文取材的“非虚构”特色，也应该包括作者的情感之“真”与写作之“真”，亦即书写的是真情实感，在凸显“我”之色彩中尽量做到客观描述。谢冕教授的散文创作历来以“真”见长。他在《觅食记》中表现的一位“吃货”的生活情趣令人难忘，但更为可贵的是，他表现出了美食背后人间最真挚的情义。《登楼记》记述了作者在晨练中意外摔倒、历经手术、康复、重新学步的艰难过程。这篇散文表现出面对人生的磨难，作者乐观向上的态度，以及永不停歇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精神。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只有真实性方能写出大境界。彭程的《亲爱的乔乔》是一位父亲为患绝症离世的女儿写下的深情而哀伤的挽歌，无言的伤痛感人至深，深沉的父爱力透纸背。杜卫东的《我寄愁心与明月》写的是师生之情，马小起的《独留明月照江南》写的是父子之情，深情的文字令人阅读之后，仍能感受到纸短情长的余韵。

由感觉产生感受，是散文写作的前提。刘琼的《南京，南京》从童年记忆中的“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厂”这一行字写起，再写到“第一次长途远行，从南京浦口站出发赴兰州读书”的深切感受。其实，这些都是作者的情感铺垫。直到凌晨的南京城里，“路边的早点铺已经支起来两三家，馄饨、面条、五香蛋以及油锅里现炸的油条、糍粑”，对南京才有了真切的感觉。于是，就有了“南京既是远方，又近在眼前”的感受，也有了



“走过去，回头看，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必然存在”的人生感悟。

散文之美，除了有诗情画意、人生哲思等，还在于有意趣。江子的《一件袍子》从一位同事爱穿袍子写起，再写到袍子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再写到袍子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再写到身着袍子的近代仁人志士的群像……之后，作者才进入正题，说道“一件蓝色的棉袍”，“它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角”。由此写到袍子的演员，写到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江子的叙述看似柔软，却给了读者内心重重的一击。袍子是道具、是文化，更是活生生的人。“我配穿上这样一件袍子吗？——我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样一件袍子，随时准备成为这样一件袍子中的人？”这是作者的灵魂独白，亦是时代之问。弋舟的《这埋葬一切正经与不正经的大墓》从考古发现出发，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寻找，发现，把历史的沉浮与人生的起伏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叙述的别样乐趣。这或许是一个小说家对散文达意方法的贡献。

选本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学评论的重要形式。选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倡导，对于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这个选本，我们可见编者选者大浪淘沙的学术襟抱与严谨态度，可见过去一年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与艺术追求，以及新时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与光明前景。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院长）